

郭嵩燾



GUOSONGTAO
YUJINDAIZHONGGUO
DUIWAIKAIFANG

王晓天 胥亚 / 主编
岳麓书社

近代中国对外开放

目 录

代序

- 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开幕词…………… 王晓天(1)
- 郭嵩焘的历史定位…………… 田海林 宋淑玉(6)
- 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思想超越…………… 郭汉民(19)
- 近代化史观与郭嵩焘的历史定位…………… 李喜所(29)
- 郭嵩焘简论…………… 李立泉(31)
- 郭嵩焘是什么派…………… 岑生平(38)
- 略论郭嵩焘的先知先觉…………… 夏剑钦(46)
- 论郭嵩焘生平及其思想…………… 郭致和(52)
- 郭嵩焘与李鸿章的交谊述论…………… 刘学照(56)
- 曾国藩与刘蓉、郭嵩焘交谊考论…………… 王澧华(59)
- 郭嵩焘、左宗棠交恶考述…………… 顾 琪(71)
- 论郭嵩焘抚粤与罢职…………… 徐松荣(82)
- 岭表三年事事乖 疮痍先为一身哀
- 郭嵩焘第二次丢官原因浅析…………… 吴果迟(94)
- 朝暮看云百态新,人心如云险尤怖
- 郭嵩焘一生致谤试析…………… 陈宇翔(99)
- 论郭嵩焘的性格与其悲剧性命运…………… 蒋 浩(101)
- 郭嵩焘与黄尊宪: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 …………… 申玉山(107)

郭嵩焘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异同论·····	陶用舒(110)
郭嵩焘政治思想发微·····	吴和庆 万里(121)
郭嵩焘的政治道德观·····	张 钦(132)
论郭嵩焘的民本思想·····	王国宇(141)
郭嵩焘洋务思想中的民本观念·····	何培金(150)
试论郭嵩焘的国际法意识及实践·····	邹红霞(158)
简论郭嵩焘的军事思想·····	薛学共(164)
论郭嵩焘的经济发展观·····	丁 轩 刘纯阳(172)
略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	刘泱泱(175)
郭嵩焘对洋务思想的超越·····	丁平一(186)
郭嵩焘独特的洋务观·····	萧栋梁(193)
浅议郭嵩焘的“本末”论·····	曹建英(203)
郭嵩焘本末观的真实内涵及其他·····	郭世佑 徐立望(211)
中国走向世界的首任公使郭嵩焘·····	郭辉东(213)
试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成晓军 张卫波(218)
郭嵩焘外交思想简论·····	李育民(231)
“理、情、势”:郭嵩焘处理对外关系三原则 ·····	易永卿 江 楠(242)
郭嵩焘与新加坡设领·····	黄小用(254)
郭嵩焘护侨活动述评·····	刘 蔚(262)
试论郭嵩焘对外开放思想·····	王艳玲(272)
郭嵩焘的西洋观与湖湘文化·····	宋德华 张英智(282)
论郭嵩焘对欧洲文化的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	田永秀 鲜于浩(293)
论郭嵩焘与传统文化·····	谭承耕(302)

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承接和发扬·····	钟兴永(304)
郭嵩焘文化人格论·····	王继平 史玉华(309)
论郭嵩焘的“人心风俗”思想·····	袁洪亮(319)
郭嵩焘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李长林(329)
郭嵩焘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考察·····	薛其林(339)
郭嵩焘对西方人际关系的考察·····	刘冰清(346)
郭嵩焘对西方社会公益文化事业的考察·····	胡长明(356)
郭嵩焘对西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考察·····	余幼钦(366)
郭嵩焘眼中的西方财经世界·····	朱圆满(375)
郭嵩焘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	许 康 田朝辉 苏衡彦(387)
郭嵩焘对西方教育的考察·····	贺金林(395)
开眼看世界与郭嵩焘的教育思想·····	夏 泉(403)
郭嵩焘教育思想简论·····	杨惠兰(411)
郭嵩焘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黄 林(417)
郭嵩焘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	彭平一(423)
郭嵩焘与留欧学生·····	张力军(425)
郭嵩焘与晚清道统观的演变·····	朱汉民(430)
试论郭嵩焘的哲学思想·····	王强山(441)
船山思想的第一个同乡知音 ——郭嵩焘对王船山的评价及其所表明的·····	王立新(446)
郭嵩焘易学研究方法论·····	任俊华(452)
郭嵩焘治学思想初探·····	熊乡江(454)
略述郭嵩焘的宗教观·····	徐 麟(463)
郭嵩焘对基督教的考察·····	杨代春(467)
郭嵩焘与佛教·····	邢亚莉 徐荪铭(471)

郭嵩焘论《庄子》·····	王兴国(478)
郭嵩焘毁板《湘军志》·····	易孟醇(488)
铸史熔经、气雄格老 ——郭嵩焘诗论诗作浅识·····	伏家芬(495)
岳阳楼诗歌与湘阴三郭的忧患意识·····	熊培庚(503)
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综述·····	郭汉民(508)
编后记·····	(520)

代 序

——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开幕词

王晓天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生于1818年，卒于1891年。他是近代中国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对内，面临着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对外，面临着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郭嵩焘的生平事业，是与这两对矛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生在政治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件是积极鼓吹向西方学习，并且成为中国第一位派驻西方国家的钦差大臣。

郭嵩焘在国内的官场生涯，基本上是与太平军起义运动相始终的。当太平军攻入湖南时，是他先后动员左宗棠、曾国藩出山。当湘军组成之后，他又提出了组建水师、开征厘捐的建议，使湘军不仅在军事上与太平军周旋更加灵活，而且在军饷上无后顾之忧，因而成为湘军的高参。此后，他在国内的任职，主要也是为湘军筹饷；并且是在他署理广东巡抚期间，与左宗棠配合，消灭了太平军的余部。对于郭嵩焘在政治上办的这件“大事”，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当然不能肯定；但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有很多问题还是值得进行探讨的。

郭嵩焘又是中国最早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之一。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曾在浙江亲自参与抗英斗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又在天津亲自参与海防事宜。通过这些事件使他认识到，“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即中国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是不

可避免的客观历史趋势。因此,他不仅利用一切机会,虚心了解和体察西方情势,而且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经验的研究,认真总结“取夷之道”。到了19世纪70年代,他成了朝野公认的最“精透”洋务的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被派遣为中国第一任驻西方的出使大臣,先任驻英公使,继而兼任驻法公使。在两年的出使期间,郭嵩焘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在做好公使本职工作的同时,抽出大量时间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历史、文化乃至生活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和认真思考,并且详细地记载在自己的日记之中。他向西方学习的实践和理论,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位先进的中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刻对比研究的宝贵思想资料,而且在当时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也有力地推动了湖湘文化向近代的转换。

首先,郭嵩焘发扬湖南人那种“特别独立的根性”,即不怕艰险,不畏人言,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与各种落后保守观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声疾呼、反复宣传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在近代中国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中,郭嵩焘是遭受攻击和诽谤最多的一位。谭嗣同说过:“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先(嵩焘)侍郎,湘乡曾劼刚(纪泽)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若是之名实之不相契也。”当郭嵩焘被朝廷任命为出使大臣时,湖南有人编了一付对联,攻击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他的赴英途中所记日记《使西纪程》被同文馆刊刻出版后,朝廷有御史大臣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其副使刘锡鸿则公开攻击他为“汉奸”。面对这种种攻击和诽谤,郭嵩焘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坚持不懈地向人们进行西学启蒙。当他从英国回国不久,一友人劝他“见人不谈洋务”,他回答说:“吾谓并不见人,

然固不可不谈洋务。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余。……夫惟其知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感，把郭嵩焘推到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线。

其次，郭嵩焘以敏锐的目光，最早认识到学习西方，须辨本末。早在1875年，当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口号刚刚形成不久，郭嵩焘就运用王夫之“体用统一”的思想，明确指出：“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郭嵩焘的本末论的内涵很丰富，既包括“以通商为本”，即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又包括“以政教为本”，即要求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还包括“以人心风俗为本”，即要求改良落后的人心风俗。郭嵩焘的这种本末论，使他的思想有别于洋务派，从而步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范畴，并且直接影响到了谭嗣同、梁启超等人。

第三，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位驻西方国家的公使，不仅奠定了中国驻外使馆的基本操作规程，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套新的外交原则。面对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新的外交格局，郭嵩焘认识到不能再以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点对待西方国家。因此他反复批评那些“尊王室、攘夷狄”的观点，认为外交工作不等于战争，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他企图立足于国家长远利益确定对外方针，为国家稳定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他提出的一些外交原则，如“知时审几”、“以理制胜”、“以礼相待”等，对于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第四，郭嵩焘还以哲学家的深邃眼光，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原本是个经学考据学的命题，到了近代才由曾国藩将它变成一个哲学认识论的命题。郭嵩焘的高明之处，就是通过对西方的认真考察，将这个命题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第一次明确指出：“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

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中国向西方学习,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878年,他在从英国归国前不久,读了张焕纶的一个条陈后指出:张氏“于交接洋务未能尽其窾要,而于洋情为有得矣。然知洋情之为然,而不知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殆犹知彼而不能知己者也。其言蒙养书院章程,大致以西法佐中法,而实不外古人实事求是之意。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郭嵩焘在这里提出的学习西方必须知己知彼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所谓“知彼”,就是要懂得洋情是什么,所谓“知己”,就是要懂得西方的东西能否在中国行得通。中国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表明,相对来说,“知彼”还比较容易,只要虚心体察外国的情况即可;而“知己”则非常困难,全盘西化派和教条主义者就是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知己”之所以难,就难在需要“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这里不仅要于“交接”之处“尽其窾要”,而且因为将“西法”转化为“中法”,需要经历一个吸收、消化的过程。郭嵩焘在中国刚开始向西方学习的起步阶段,就能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他对实事求是的这种理解,促进了这个古老命题向现代的转换,为毛泽东后来对它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作了必要的历史铺垫。

以上我们仅从郭嵩焘对待西方国家和西学的态度,进行了一些初步分析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些思想中的确有很多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借鉴。

郭嵩焘在湖南近代是一位著述丰富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包罗广泛的学术领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掘的丰富矿藏。但他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改革开放以来,郭嵩焘的著作才得以较多的出版,对他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热点。这既是学术界历史观进步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使然。为了推进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既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当前实践的经验教训,也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

来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而对郭嵩焘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是可以在这方面得到较多收获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次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的召开,是既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对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的研究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某些观点的分歧,这完全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这次研讨会,也将本着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这些不同的意见,在讨论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化。“真理以比较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我们衷心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将郭嵩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和湖湘文化的研究,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郭嵩焘的历史定位

田海林 宋淑玉

郭嵩焘生当晚清内忧外患交并之时,时人或目为“汉奸”;或赞为“百世之师”。百余年来,沧桑多变,因设定的品评标准不一,学术界对其历史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郭嵩焘是晚清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对其褒贬誉毁,必须建立在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之上。考察其言行,研究其是非,理解其时代,认识其作用,对探寻中国近代化的轨迹,对资鉴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唯有如此,才能不致于使郭嵩焘生前“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¹⁾的狂狷自命永无历史回音。

一、 经世派的后劲

郭嵩焘是湖湘文化的近代产儿。湖湘文化,宋代以前茫然无甚可表。自宋代周敦颐出,岳麓书院形成,既穷理尽性以思辨,又通经致用以济世的湖湘文化,方才发轫雏形。明末清初,王船山才高学富,著述等身,因节清气傲而隐逸,迄近代才得光大于天下,堪称近代湖湘文化之酵母。清朝嘉道以降,由于历史风潮所激,湖湘士子拔地崛起,不仅于内经世致用走向全国,而且于外栉欧风、沐美雨,救亡、启蒙,从“开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从陶澍、魏源等先驱始,大批湖湘士子冲破保守愚昧、强梁自私的传统状态,慨然卓立,以经营天下为志,他们“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²⁾这种文化的史局,使郭嵩焘自青少年起便深受湖湘经世致用传统的熏染。

郭嵩焘 19 岁就学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乃湖湘文化之中心，自南宋朱熹、张栻之后，思想上的忠孝廉节、学风上的经世致用，相沿成习，深深影响了历代每一位来此朝圣就学者。岳麓书院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一语成谶，到近代中国史上终于幸而中验了。清朝嘉道年间，士习不端，人才困乏，学风败坏，吏治衰恶，内忧而又遭外患侵逼，为澄清天下，有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派出道崛起，而经世派人物芸芸，籍隶湖湘者甚多，若以影响之广大深远论，必当首推魏源。魏源即出身于岳麓书院。魏源为学非汉非宋，实事求是，“以经术为治术”，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辑录《皇朝经世文编》，集有清以来经世致用文章之大成，承前而启后，一旦刊行，“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³⁾，以至“数十年风行海内”⁽⁴⁾。与魏源同调者，如汤鹏、贺长龄、贺熙龄、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丁善庆、邓显鹤、唐鉴等人，尽管他们在学术流派上未必划一，但均注意于经邦济世，都是湘籍经世派大家族成员。这一流人物相与往还，以乡为党，关心时务国事，深究天下利病，对清朝的漕运、河务、盐政、科举、官制、赋役、钱币、兵丁、边舆以及道德、风习、学术等，都提出了查漏补缺性的建言，使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大地成了经世派的大本营。在这种特定的学术地理氛围之中，郭嵩焘通过在岳麓书院读经观史，耳濡目染，产生并形成了“保邦制国”⁽⁵⁾的经世思想。

在自汉迄清儒学统治的“经学时代”，《大学》中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的文化哲学，一直是历代士子“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郭嵩焘寄身于儒家思想文化堡垒的岳麓书院学习，这种积极入世的观念，自然会成为其崇高的心理祈求。受湖湘经世派的精神关照与文化影响，一方面，郭嵩焘极其重视对前辈乡贤经世思想的传承，广泛披阅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郭氏虽未见过魏源，但对这位经世派巨子深为服膺，在研读《海国图

志》后评道：“益精且博矣！魏氏此书征引浩繁，亦间有参差失实，要其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⁶⁾对经世派其他人物的时论专著，郭氏亦多有评点或读校。另一方面，郭嵩焘与经世派人物亦时相过从，他曾与龚自珍、魏源都十分钦敬的今文经学大师宋翔凤论学，“久坐畅叙”⁽⁷⁾；曾与舆地学名家何秋涛讨论何著《朔方备乘》一书，该书对中俄边疆舆地考辨精审，为经世派研治西北边疆舆地的代表作。在郭氏生平思想中，其关注域外海疆塞防，且虽宗宋学而又尚“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显然与继承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何秋涛以及宋翔凤等经世派人物的文化传统大有关系。

在鸦片战争时期，郭嵩焘对禁烟、河务、漕运、钱粮、刑名、兵制、海防、饷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社稷大政，都有过值得重视的思想言论，与林则徐、魏源一样，走的也是由“内圣”而“外王”的儒士经世致用的思想道路。

经世派形成于清朝嘉道年间，是地主阶级阵营中富有政治活力的自救派，是他们自觉的思想与积极的活动，维系着天日已斜的封建王朝的照旧统治，当天漏日残之际，他们是一批洋溢着地主阶级统治自救本能的补天者。出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对农民起义的反政府态度必然是敌视的。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参与过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左宗棠作为林则徐、魏源等人经世事功的继承者，更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烈焰几乎焚葬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大厦，是曾国藩、左宗棠等铁血人物挺身而出，为清王朝重新定鼎的，而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清王朝之所以能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郭嵩焘是起了极重要作用的。郭嵩焘虽以一介书生之文弱，但尽输对清王朝之忠诚，审时度势，凭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服了丁忧守制的曾国藩夺情出山；仗二行伶俐之齿，竟然举荐了科甲未第的左宗棠得委重任。曾氏之“墨经从戎”，左氏之破格晋升，郭氏居有大功，三氏姻亲联盟，通家为国，

事实上组成了一个为清王朝砥柱中流的湘籍政治军事集团。当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是郭嵩焘联络曾国藩、左宗棠等经世干才，组织起了一支由团练起家的湘军，替代腐败的八旗与绿营兵为清王朝解了肘腋之患，救了头燃之急。

与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前辈一样，郭嵩焘从来都是急清王朝之所急的。湘军作为由团练起家的地方军队，特别是在清政府财政极为支绌的形势下，是不能靠皇粮维持的。为了湘军的饷银，郭嵩焘倡创了湖南厘金制。对此，他自称：“不复以仕宦为意，而于经营国计，保卫地方，无敢稍释于心，始终未一任事，而在湖南筹兵筹饷，一皆发端自鄙人。”“曾文正公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湘省厘捐及粤、淮盐厘）以济军食，而湖南亦恃此以为富强之基，支柱东南数省。”⁽⁸⁾这并非郭氏自夸之辞。厘金的高妙之处在于：“夫酒榷茶榷，其类繁，或有税或无税，或重或轻，其弊为甚，故不如厘金，视百货屯聚之处，笼而取之，为公而实。今天下之利一出于商贾，取之以厘计，至约也。所取于商贾者，为厘以二、三计……于商贾何害？然吏竟取之民，则足以致乱。取之商贾，而民安焉。”⁽⁹⁾郭嵩焘创办厘金制，固然因盘剥商贾阻碍了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的商品化发展，但却为湘军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无饷不养兵，湘军筹饷成功，各地团练纷纷仿效。1854年之后，河南、江苏等地广泛推行厘金制，而且得到了清政府的正式批准。翌年，湘、鄂、川、皖、闽、新、奉等地都实施了厘金制度。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及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镇压了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而这两支铁血之旅都是靠厘捐养活的。郭嵩焘倡创厘捐，事实上等于起了为清王朝输血的作用。另外，为了与太平军争夺长江水面的控制权，郭嵩焘又展一筹，倡议设了湘军水师，湘军水陆夹击，终于成就了沦陷天京之功。由此可见，郭嵩焘虽然被曾国藩认为“非繁剧之才”，但却运筹帷幄，妙计叠献，为镇压农民起义而扮演了摇羽毛扇的军师角色。郭嵩焘之筹厘金、创水师，与林则徐、魏源等经世前

辈的事功相比较,无论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上,都是同具为清政府服务性质的。

通经致用,由中学而涉西学,这是经世派的一个重要特点,魏源就是如所周知的典型代表。郭嵩焘在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上,走了一条几乎与魏源同样的道路。郭氏出身于岳麓书院,于经学尤长于治“礼”,有《礼记质疑》、《订正家礼》;对《大学》及《中庸》颇有心得,有《大学中庸质疑》;对“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诗说亦不陌生,有《毛诗正义》。魏源是今文经学家、曾国藩是理学家,郭嵩焘远敬魏源而近追曾国藩,尽管他不是个今文经学家,亦非理学家,更不像个汉学家,但坐以通经,起而致用,与魏源及曾国藩比,毫不逊色。魏源是既关注清朝国力强弱,又“开眼看世界”的人物,有《圣武记》与《海国图志》,郭嵩焘又何尝不是如此?郭嵩焘著有《绥边徵实》与《使西纪程》,他一样重视边防舆地,并且由“开眼看世界”而出使泰西,“走向世界”,在由中学而涉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也是有着创榛辟莽、筚路蓝缕之功的。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笔者认定郭嵩焘是魏源等经世派前辈的继承者,是经世派的后劲。

二、洋务派的智者

晚清时代,天下大变。郭嵩焘蒿目时艰,奔走呼号,处心积虑,苦行卓厉,以“内圣”之质,为“外王”之表,在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时期,既是清王朝干城,又是同侪群伦之主脑。洋务运动起,郭嵩焘又躬身先行,衷中参西,为富强之谋,展春云之彩,高论累呈,成了洋务派的智者。

郭嵩焘是颇能代表鸦片战争之后晚清历史进程的人物,他由经世派自然成为农民运动的镇压者,像林则徐;再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之“中体”而兼采“西用”,由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进化成洋务派,如曾国藩;至于其在思想文化上由“开眼看世界”而开步

“走向世界”，似魏源。

洋务运动是因内部镇压太平天国之需要，外部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强烈刺激，为了替清王朝“求富”、“求强”而在同光年间勃然兴起的。洋务派大致分两大势力：一是居廊庙之上的枢要人物，如奕訢、文祥等，一是处封疆之任的实力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在同光年间，清王朝处于“古今未有之大变局”中，为了应对这种“大变局”，朝野上下交哄，形成了一种在社会上带有普遍性的洋务思潮。在洋务论者之中，虽然都囿于“中体西用”的思想范式，但在维护“中体”的动静态度上和吸纳“西用”的宽窄界量上，又可以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如薛福成、冯桂芬、郑观应、马建忠、王韬、陈炽、陈虬等所谓早期改良主义者（或称早期维新派）之伦，右翼如上述之中央或地方官僚。左翼多在野，“西用”色浓；右翼在朝，“中体”味浓。郭嵩焘既被在朝者所青目，又为在野者所推崇；虽未亲自主持洋务实业，但却谙悉洋务情事；不仅内卫“中体”，而且外采“西用”，左右逢源，清标高道；一方面置身于洋务大潮之中，另一方面又超然地指陈洋务运动之陋弊，堪称是一位通时势、济世变，敢于放言高论的理论家。

从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这个“中体”的政治思想路线上论，在洋务运动前期（1861～1866年间），为了替清王朝解除内忧，平定农民起义，郭嵩焘不断出谋划策，据《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统计，关于“剿匪”内容的奏疏折片竟达近百种之多。郭嵩焘为清王朝荡平内乱之后，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又开始接受西方侵略势力的挑战。从为清王朝谋求富强、兼采“西用”的文化观念上论，郭嵩焘识高一筹，呼吁创设了专门的外语学校，以求“开眼看世界”，了解西方文化，做到知己知彼。早在1859年，他就曾上书条陈制御远夷之道，指出已与西方“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这是夷人“无复顾忌”而我方屡战不胜的重要原因，他根据中西交通的历史

经验教训,认为“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略”,“必务疏通其情”⁽¹⁰⁾。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感到有理,遂饬令王大臣议行,但由于清朝以来长期闭关政策与蒙昧主义的束缚,“而终无敢赞一词者”⁽¹¹⁾。但中西文化交流之门一旦被打开,是无法再重新关闭的。对学习外文洋语之事,虽然像倭仁那样的顽固的封建卫道士盈于朝野,但是三年之后,学习外文洋语的京师“同文馆”还是正式诞生了。郭嵩焘这一奏疏,可以说是晚清史上呼吁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孤独先声!受洋务风潮的席卷,在京师“同文馆”的影响下,冯桂芬在上海也提出了与郭氏相似的建议,并被李鸿章采纳,1863年上海“广方言馆”得以成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冯桂芬与郭嵩焘是洋务至交,查《郭嵩焘日记》同治二年(1863年)条有:“拟同文书院章程十四条交黄荷汀。”可知上海“广方言馆”之章程系出自郭嵩焘之手。由此可以说,在洋务派人士中,郭嵩焘比那些只重视办工商实业者更高明些,他看重的是工商背后的科技,于是以办外文学校以发展文教事业为向西方寻求富强之道的入手之处。向西方学习,务求文化本源,郭嵩焘不愧是洋务派的智者。

在以“求富”、“求强”相标榜的洋务事业中,郭嵩焘也比其他洋务派人士有着更为高瞻远瞩的文化理念。他认为,若欲“求强”,必先“求富”,反对洋务派的某些头面人物只注重盲目仿造坚船利炮。1875年,郭嵩焘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¹²⁾“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覬覦,亦何惮而不为之?而以西洋聚精会神擅强数十百年之术,强中国一日行之而遽责其抗衡,据一时之议以尽各海口之变,果足恃乎,果不足恃乎?此所不敢知也。”⁽¹³⁾显然,郭嵩焘看到了洋务军工企业一味追求仿造船器而不懂西方民主政治与文化教育是本末倒置,徒袭洋人之皮毛。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发展道路经历了